

文物活化利用中 价值认知内涵的新变化

田林 侯晓萱

2021年11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根据《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文物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注意到《意见》对价值的表述侧重点与《准则》有所区别，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区别，二是科学价值与科技价值的区别，三是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的区别。

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发展七十年来，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动态发展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愈发显现，文物保护利用的要求愈加提高，其价值认知也有了新的变化与侧重。探索其内在逻辑，辨析其认知的前后变化，是未来更好开展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的前提。

新时代对文物活化利用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更加突出。新时代，是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更具有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的时代。

文化自信在现阶段被不断强调，它是国家砥砺前行根本，是民族繁荣复兴的保障。文物作为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化积淀与传播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它是先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文化成就与人类瑰宝，是民族文明延续、生生不息的内在脉络，是新时代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

我们珍惜保护文物，然而文物绝不是仅供陈列的摆设，也不是僵硬的化石，新时代背景下，让文物活起来，要更加以人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历史的认知需求；要更加能够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色彩。在此语境下，文物价值认知便产生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变化与发展。

从艺术价值到审美价值： 大众主体参与的突出强调

《准则》中对艺术价值的解读是指文物古迹作为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特定时代的典型风格的实物见证的价值。它体现出来的是文物本体所反映的时代艺术风格、工艺技术水平等，也包含里面凝结的古代艺术大师、劳动者的美学智慧与实践经验。在艺术价值的评估中，我们可以追溯一件青铜器的纹饰象征，也可以挖掘一座清代官式建筑的设计巧思。总而言之，艺术价值更强调凝结于文物自身的价值属性，是不受所处环境和鉴赏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客观价值评估。

审美价值，在《新编美学辞典》中的解释为审美对象能够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引起主体审美感受的某种属性。审美作为一个动词，可以理解为人所进行的一切欣赏美的活动。在欣赏美的过程中，客体(文物)对作为主体的产生了美学意义和心理效能，进而产生了审美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意见》对审美价值的提出，将作为主体的人拉入了对价值认知与感受中，构成了人与文物之间的主客观关系。

相较于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更加强调大众作为主体参与者的地位，强调人民群众在文物的欣赏、体验、认知中的参与性。文物价值评估从之前的仅侧重客体评价到兼顾主体与客体评价的转变，是一种更加以人为本、注重人性的转向。在新时代强调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坚持文物惠及大众，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思考，是文物活化利用的方向。文物价值展现不应是束之高阁、曲高和寡，而是融入当代、融入生活、融入普通人的心中。因此，审美的视角就是广大群众的视角，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让人民感受我们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从古老文化中汲取养分与力量，从而激发其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这也是对文物活化利用的新要求。

从科学价值到科技价值： 技术成果落地的活化实现

科学与科技，两者联系密切但又有所区别。前者重点解决理论问题，是人类探索、研究和理解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后者侧重解决实际问题，是采用一定手段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实践问题中去。因而文物的科学价值就其本来来说，侧重于文物自身所内涵的科学原理和理论知识，而科技价值除包括科学内涵外，还应包括技术的实践与落地。

《准则》中科学价值的解释是指文物古迹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和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或创造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实际上，这个解释已经将其内涵拓展至

科技，既包括了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古人创造发明的科学理论，也包括了通过物体现出来的工艺技术及实践落地。《意见》中以科技价值的方式表述，更是强调了对文物价值中技术层面的研究发掘与保护利用，在反映文物所处时代科学技术水平、展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活化利用所承载的技艺，以创新的形式实现文物科技价值的落地转化。

新时代的科技革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竞争在世界舞台不断上演。如果说大国重器在国际科技竞赛的出色表现是我们新时代发展的保障，那么对文物所蕴含的古代科技的传承就是我们新时代发展的底气。万里长城所呈现的浩大气魄，都江堰与大运河所体现的治水智慧，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所呈现的科学构造，都是古代先辈智慧的结晶，是科技精神传承中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做好科学技术的继承与发扬，全面推动文物技术成果落地，通过活化利用，实现推陈出新。比如，我们可以借助传统木构建筑技术推动新式木构技艺的发展；同样，我们也可以研究新型材料使沉寂在文物中的营造技术产生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活态发展。通过强调科技价值中理论与实践的并重，挖掘深藏于文物中的科学技术，使之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

从社会价值到时代价值： 文物保护视角的拓展提升

社会价值包含了记忆、情感、教育等内容，在《准则》中的解读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文物有其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蕴含着社会变迁，见证着政权更迭，记录着思想沉淀、美德传统和人文精神。

时代价值的提出则是凸显了价值认知的时代性，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文物利用工作的新期待和新展望。社会价值着眼于客观的视角，关注于文物所带来的知识传播性和社会共识性，而时代价值则是基于时间序列，立足于时代发展进程的视角对社会综合价值进行评价，它除了包含社会价值的内涵外，还强调文物的当下价值，且更富积极向上的内涵。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转折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疫情挑战重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以社会价值认知为基础，凸显文物利用的时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文物的时代价值要求我们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更加彰显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站在时代的潮头，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文物进行新时代的价值解读与阐释，推陈出新，探索新的文物保护利用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让文物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过去走向未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逐步创造文物交流、文化互鉴、文明共存的共同体，探索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模式。

从静态保护到活化利用的侧重转变

《意见》中对价值表述侧重点的转变，让我们看到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对作为文化参与主体的强调，对文物科技落地实现的重视，对时代视角国际站位的提升，同时也对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静态的文物保护利用即将成为过去，文物保护不再是单调的修缮与收藏，它将带着历史的声音与温度，走向人民群众，走向世界舞台。以创新方式对文物进行活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融入生活，服务人民。我们要努力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文物成为联系的纽带，串联起几千年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我们要努力连接世界上不同地区、民族和人群，通过文物活化利用与交流，贡献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思想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艺术研究所、北京建筑大学)

“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对文物工作的启发

赵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同时指明了系列路径，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其中特别提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笔者备受启发，特书几点学习体会和理解思考，以增进交流。

拓宽研究的时间范围，就是要梳理清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覆盖了文明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从脉络梳理所依赖的材料和发展阶段来看，宏观上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关于史前时期的了解和研究，主要依赖先民们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探索当时的人们怎样生产生活，有着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精神文化世界，进而归纳总结其文化特色，探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近年来，国家对考古工作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工作的大力支持，就体现了对探索史前文明历史的高度重视。在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在大江南北发现了众多史前文明遗存，相关认知和研究也越来越丰富。

关于历史时期，我国是文献大国，拥有经史子集等大量的史料，它们是研究过去历史和文明的宝贵典籍，再加上实物遗迹的考古学调查、出土文献的整理、文书档案的利用等，就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出我国文明的历史脉络和诸多文明的细节。就像考古学家齐东方先生所言，“通过考古发现再结合历史文献，历史变得有视觉，有触觉，有听觉。就像编钟，你可以听到两千年以前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

见证文明历史的遗迹、遗物、古籍等，都是珍贵的文物，正是基于大量文物遗迹和历史文献的调查研究和释读，我们才能看到“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那些丰富的文物古迹、文献典籍以及传承有序沿用至今的文字和记录，都值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引以为豪。

拓宽研究的时空范围，就是要从文明载体的空间分布、扩散及其影响等空间视角，“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的空间认知，经历了“黄河流域”单中心到长江、西江河流域等多中心的拓展，经过考古学家百年以来的努力，揭示并达成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发展的共识。

苏秉琦先生着眼于不同空间地域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提出过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说，包括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严文明先生提出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都是根据考古资料的发现而做出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提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搭建了文明发展演进的时空框架和脉络，以及对后世基本文化格局的影响。历史时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往来，不断地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紧密。

从拓宽“覆盖领域”来看，就是要发现社会文化领域更多能够见证文明历史和促进文明发展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力量

社会文化可包括祖先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及其文化表现。物质性文化大到城乡聚落和长城、运河等大型构筑物，小到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物质载体；精神性文化如社会治理、思想文化、礼仪信仰、风土民情等，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角度来综合观察。

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从先秦时期的“五服”“九州”等空间治理模式的表达，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奠定了我国无比稳固的多民族一统的制度文化和心理基础。

从经济层面来讲，我国早在新石器早中期，已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和西北渔猎牧业三大经济区，奠定了后来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基本经济格局，以及各地域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密切往来，亦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经济基础。

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形而上的层面，文化经历了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的演变过程，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向心力极为强烈，始终对周边地区和民族构成强大的吸引

力；与此同时，地方性文化的时代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始终存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兼而有之，尤其是形而下的风土民俗层面，表现得极为丰富多彩。

文物是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的物质载体和印记，在时间、空间、文化的构成等诸多方面与历史文明的脉络相互印证

文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环境的状态”(谢辰生先生语)，见证了我国悠久的历史、人地关系和博大精深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可以通过文物的时间演变、空间分布、构成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来增进对文明历史和大地域国家的深入认知和理解。

文物产生的时间和延续性，与文明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明历史，孕育了我国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文物资源。通过文物的“发生史”“发展史”，可梳理出文明的“演变史”。只是文物的保存会受到历史变迁、自然变异等影响，越是历史的早期，能够保存下来的就越少，越需要专门的探索、保护和解读。

文物的空间分布和流变，也是和文明的空间格局和进程一致的。如果我们将文物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文明的代表性构成要素，按照时间的进程，进行空间上的标识，就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它们在时空上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从文物的构成和内涵等角度来观察，可了解到文明的诸多特点以及“覆盖领域”，不管是形而上的政治思想文化，还是形而下的衣食住行等物质载体，都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和立体的综合性。

正如孙机先生所言，“现今尊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话。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过去。倘使角度合宜，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独特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的美的闪光。”

基于对文明和文物“拓宽时空和覆盖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更为充分地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为当下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

从自然环境来观察，我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又复杂多元的地貌单元，东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有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北有广袤的沙漠草原，这样的地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明发生和演进的空间格局。区内河流的分布、三级阶梯地貌特征以及季风气候下干湿度的分布等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影响极大。总体来讲，东部季风区、大江大河中下游、中东部的平原、丘陵、盆地，更为宜居，这些地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文物资源也更为丰富。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三阶梯约占58%，二阶梯约占40%，一阶梯仅占2%左右；东部季风区占90%以上，其中南部湿润区占了50%左右。

从人文角度而言，人是文明和文物的主体。越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往往是文化发达、文物聚集的地方。综合来看，文物当然也是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的宜居地区，尤其是著名的胡焕庸线(瑗珲—腾冲线)以东，既是我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文明发展和文物资源聚集的主要地方。不论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还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登录文物，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线以东的地区。这样的空间特征，与人口聚集、地域开发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军事中心的设置等密切相关。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文物密集区，历史上也往往是或大或小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 and 主要聚落所在地。

从历史上看，文物资源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和条件影响下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基本文明空间格局是一致的；越是宜居的地方，人口越聚集，文物古迹越丰富，文化越发达，文明程度也就越高。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的要求，指引我们从时间、空间、覆盖领域等多种维度和多重视角，深化对文物和相关文脉的认知和研究，既有助于挖掘、展示和解说更为丰富的资源、主题和内容，也有助于增进对文明发展时空脉络和内涵的理解，并为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发展更好地贡献“文物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